

论当代人写当代史

曹守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史学界有一种非常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当代人写当代史不能保证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从中国史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代人写当代史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晚清民初,思想界对于民史、君史、国史、党史关系的讨论,彰显了当代人写当代史在理论领域的与时俱进,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撰实践的得失也表明当代人写当代史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中最大的启示是设立国史馆。

关键词:当代史;官修;私撰;国史馆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5)03-0040-07

DOI:10.16207/j.cnki.1001-5957.2015.03.009

从史学产生的过程看,由于书写历史著作的史家是处于特定时代的个体,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所以作为历史著作一种的当代史当然也就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史学界对隔代修史、后人修前朝史的做法习以为常,以致于这种观念掩盖了中国传统史学编撰上的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史学实践。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隔代修史、后人修前朝史是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唯一途径,至于当代人撰写的当代史著述最多只能算是史料的积累,当代人修当代史的意义和价值被极大地低估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代人写当代史”也就具有了值得深入探究的意义和价值。本文所阐述的“当代人写当代史”指的是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史家对于他们所生活时代记录和撰写状况的考察和探究。从撰述主体来看,大致有官修(则有国史之称)和私撰(私人撰写的本朝史著述)两种。

一、当代人写当代史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近现代史学受到了西方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影响,遂有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观点流传。这种认为中国古代有当代人不写当代史传统的观点,其实是似是而非的说法。熟悉中国传统史学史的人都清楚,正史中具有当代人写当代史性质的史书在在多有。

仅从正史、国史编纂情况看,司马迁撰写《史记》,其中对当代史的书写多被后世史家称赞。班彪认为:“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1]1325}班固“其言秦汉,详

矣”^{[2]2737}。刘知几也说:“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3]138}当代学者更是对司马迁的当代史作过详细统计分析。《史记》130篇,其中完全和重点写当代史的有66篇,加上其他篇章还有写当代史的内容,实际上司马迁是“用半数以上的篇幅记述近百年的当代史”^{[4]41}。陈寿(233—297年)撰《三国志》虽成书于西晋,但因为是私人撰修,所以使得陈寿在蜀汉时,“初应州命,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的经历是异常宝贵的。晋武帝西康元年(280年)灭吴,中国统一,时年48岁的陈寿开始整理三国史事,撰写《魏书》、《吴书》与《蜀书》相对独立的三部当代史,迄北宋时才合为一书。北齐魏收(505—572年)撰《魏书》之前曾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26岁时“敕典起居注,并修国史”^{[5]483},所撰《魏书》更是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其中魏收生活的时代完全包括在内。南朝梁沈约(441—513年)受命撰写《宋书》时,距离刘宋政权灭亡已有8年。这期间,已经有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撰著刘宋国史,而徐爱撰成的国史则为沈约提供了文献资料。南朝梁萧子显编撰《南齐书》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唐代国史撰述包括起居注、实录和国史三个方面。《唐会要》记载了唐代国史撰修的情况,所记起于贞观十七年(643年),止于大顺二年(891年),差不多贯穿了整个唐代,唐代的国史撰述,以修撰实录成绩最为突出。唐朝的国

收稿日期:2014-12-22

作者简介:曹守亮(1976—),男,山东费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学博士。

史撰述主要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开元起居注》;实录:高祖实录至武宗实录共25部;国史:长孙无忌、令狐德棻等撰《武德贞观两朝史》,吴兢撰《唐书》,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撰《唐史》、《国史》。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史学活动。唐代国史编撰活动日趋活跃,不能不引起一些史学家对这些活动的反省。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几曾经给予了严厉批评。元仁宗曾对国史给予了高度重视:“人言御史台任重,朕谓国史院尤重;御史台是一时公论,国史院实万世公论。”^{[6]549}正是有了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才使得元朝国祚甚短,但国史撰修成绩突出,不仅撰有历朝实录15部,而且还有诸如《蒙古秘史》、《圣武亲征记》、《国朝名臣事略》、《平宋录》、《西使记》等当代著作。明代尽管只修实录,不修国史,但卷帙浩繁的实录仍然显示出官修史书所具有的优势。明代先后纂修的实录共15部2909卷,是关于明代历史的最完备的官修史书。《大明会典》则累三次纂修,历90年四朝皇帝过问此事,终成“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的典制体史书,以诸司执掌为主,反映了明代皇朝之下各部职能部门结构的基本情况和历史变化。清入关前,即设有“内国史院”有清一代的实录馆,是临时性的修史机构,国史馆则是常设机构,据《清会典》记载,清代国史有纪、表、志、传等体例,国史编纂,除累朝实录外,编撰国史也持之以恒,绵延不绝。

从私人撰修的实际情况看,当代人修当代史更是不胜枚举,仅就其中流传于世的典型史著胪述如下:春秋末年孔子编修《春秋》记述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历鲁国十二公,凡242年间的历史,涵盖了孔子生活的时代,可以看作是中国历史上当代人写当代史的第一次成功实践。汉代陆贾所撰《楚汉春秋》,是当时记述楚、汉间史事唯一的一部著作,是“那时的当代史”^{[7]219}。桓宽所撰《盐铁论》、应劭所写《风俗通义》,也是两部值得注意的历史评论著作,均对作者所处的时代有所评鹭。唐代史家吴兢所著《贞观政要》既是对唐太宗“政化”的仰慕,又是对唐玄宗后期朝政颓势的忧患。两宋时期动荡不安的朝政、战乱不断的民族关系,使得这一时期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变得突出而强烈。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王安石的《上皇帝万言书》等所孕育的忧患意识同样也体现在史学家的著作中。北宋司马光所撰《稽古录》记载了北宋开国至英宗治平四年间的大事,下距司马光写成该书的时间只有14年。南宋史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250卷等,都是关注当代社会历史问题的巨制。明代由于朝廷重实录而轻国史,以致于始终没有官修明朝国史问世。这种情况激发了私家关于本朝史的撰述热情。其中较为重要的国史类著述有:郑晓的《吾学编》、邓元锡的《明书》、何乔远的《名山藏》与朱国祯的《明史概》等纪传体著作;薛应旂的《宪章录》、张铨的《国史纪闻》、雷礼等的《皇明大政记》、谭希思的《明大政纂要》、陈建《皇明从信录》、陈建的《皇明资治通纪》等编年体著作;徐学聚的《国朝典汇》、冯应京的《皇明经世实用编》、陈子龙、徐孚远等主编的《明经世文编》等典制

类著作。晚明史家王世贞、李贽、焦竑、谈迁等人的历史著作,反映了有明一代的历史特点,代表了明代史家有关本朝史著述所达到的成就。

鉴于此,我们不仅可以认为重视当代史撰述是中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7]478},而且也可以认为当代人写当代史恰恰是中国传统史学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从本质上讲,当代人修当代史来自于中国古代史家对于朝代、国家兴亡盛衰的关注,以及对于社会治乱、人民生活的关注。因此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认识,往往是和史家对于现实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7]433}

二、晚清民国时期当代史编撰的新探讨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发生了缓慢而深刻的变革,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进化论与民权思想在中国思想界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学界经历着由传统治学方式向近代意义上治学方式的转变,关注的对象也开始发生由君而民、由上而下的转移。民众意识的觉醒促使一些学者探讨当代历史的民生面相,由此当代史的编撰呈现出了富有生机与创新的崭新局面。

1897年,梁启超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说:“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二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纪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8]59-60}梁启超比较明显的倾向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史的贬抑,对记载事关国家制度、民生情状的典志与会要的欣赏。相较而言,后者更加接近于他心目中的国史。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批评了易代修史的局限与不足,流露出对当代人所写当代史的肯誉。梁启超讲:“以故读断代史不如读通史,读古史不如读近史,读追述之史不如读随记之史,读一国史不如读万国史。后世之修史者,于易代之后乃始模拟仿佛,百中掇一二。有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而取威定霸,若何为固疆圉长子孙,如斯而已。至求内政之张弛,民俗之优绌。所谓寢强寢弱与何以寢强寢弱之故者,几靡得而睹焉。即有一二散见于纪传非大慧莫察也。是故君史之蔽极于今日。”^{[8]60}这一思想在《新史学》又有了发展,在梁启超欣赏的中国史学上六位创作之才中,皆因他们的史著自觉不自觉地体现了内政、民情与国势。梁启超推崇司马迁,是因为在他看来,《史记》“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空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其为立传者,大率皆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杜佑所撰《通典》“不纪事而纪制度,制度于国民全体之关系,有重于事焉”,将黄宗羲看作“我国思想界之大雄”,是因为他创立了“学史之格”,开创了专门史研究的新局面。沿着黄宗羲开辟的学术路径走下去,则中国文学史、中国种族史、中国财富史、中国宗教史之类的史著就都可以做出来了,这就能够极大改变“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的撰述局限^{[9]5-6}。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就更能理解梁启超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对西方列国岁计政要的喜爱。“以予所闻西人岁计

政要者,其所采录,则议院之档案也,预算决算之表也,民政部学部兵部海部户部商部之清册也,各地有司各国使员之报案也。自国主世系、宗戚岁贡、议院官制、教会学校、学会国计、兵籍兵船、疆域民数、商务工艺、铁路邮务、新疆钱币权衡,区以国别,分类毕载。”^{[8]61}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像西方一样将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实际情况呈现出来,并且能够对世界各国进行比较,才能够达到“国史之良哉”的水准,才能够使有天下之责者“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8]61}。无论从梁启超对西方“民史”的认识,还是从他对于“国史”内涵外延的探索,都清楚地反映出民众在梁启超新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两者在梁启超的思想中有着渐趋重合的趋势。

1898年谭嗣同受梁启超的影响,在阐述报纸的重要性时,提出了“报纸即民史”的观点。谭嗣同指出:“新会梁氏有君史民史之说,报纸即民史也,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宁不烂焉。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于民之生业,靡得而详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纪也;于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靡得而毕录也,而徒专笔削一己之私,滥褒诛于兴亡之后,直笔既压累而无以伸,旧闻遂放失而莫之恤。溢之日官书,官书良可悼也!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汶嗣嗣以穷天,而终古为喑哑之民乎?”^{[10]419}谭嗣同更是将梁启超有关民众的思想普及到了普通人。近人田北湖于1905年《国粹学报》撰写了《论文章源流》一文,阐述了民史、国史、君史之流衍。他认为:“上古始制文字,为民史之世;迟至唐、虞,为国史之世;自夏以降,纯为君史之世矣。”^{[11]606}之所以会有上述变化,主要是因为有了国家的出现,出现了阶级和国家的变化,在田氏看来,“三代属于王朝宫廷”,“文书专司于卜祝,取天下之私著,审辨而淘汰之,有不合于法宪,足以乱政者,皆屏除之。当时之所以奉守,斟酌往训,以防二心”。^{[11]606}正是因为有了统治的需要才使得这种清晰的演变富有了正当的理由和文化的色彩。“君民相与之际,使卜祝为尸寮;而私家无著作之权,其所载笔,纳诸盟府,以视其正。故卜有卜史,祝有祝史,卜明是非,祝修辞令;幽明绝通,假借准的,足以辅助治化所不逮,而齐一世俗,经制人心。及陈其迹,或编岁时,或述本末,公中之纪,灿然为文,是曰国史。然而民间之史,一付阙如矣。”^{[11]606}国史取代民史反映了阶级、国家产生之初的历史记载状况,而君史取代国史则反映出了专制集权制度的发展。很显然,作者的本意不在于梳理史书编撰的流变,而在于为作者的政治主张寻求历史的依据。“古者先有民史,而后有国史,有国史然后有君史;国史者,君民比并之史;君史者,一姓一代之史也。其旨既异,其文体迥殊。而国史者,承上接下之枢纽,君民离合之津渡,实史家变迁之机括欤!今民史亡佚,国史亦残缺不完。”^{[11]606}除此之外,田北湖还以当世所行之政体来附会他所提出的三史之学说,以说明其新民史的意向。田北湖认为:“夫古者以民权行民政,有似今日共和之政体;递嬗而为君民共主,有似今日立宪之政体;自夏传子,君尊于上,民伏于下,而不与国事,有似今日专制之政体,至周而造乎其极。故惟政有三体,史亦有三异。”^{[11]606}田氏所论已经表明实行共和政体之西方国家所代表的民意象征,充满了羡慕之情,反映出这些学者对于西

方资本主义整体认识的片面性,而其将国家、文明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的原始民主,比附为现代文明高度发展之后对于民众的关注,则又有简单、机械之嫌。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成为中国政治的主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史学家也开始思考政党与国家、政党历史与中华民族史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就不能不涉及中国国民党与那个时期的当代史之间的关系。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上国民党人吴敬恒、张继、邹鲁提出了由史学家朱希祖草拟的“设总档案库与国史馆”的议案。议案指出:“中国国史不可自吾党而绝,犹中国国祚不可自吾党而亡。”^{[12]268}在此,中国国民党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所担负的责任表露无遗,因此,特设立国史馆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朱希祖在议案中探讨了设立国史馆的隶属、建制、吸纳史馆旧制、阐扬时代新篇诸多细节问题,其中特别强调国史与党史的区别问题。他指出:“惟国史与党史必宜划分界限,盖二者性质迥不相同,必不可混而为一。”^{[12]172}同时,朱希祖从国史中宜列部分出发阐述了自己的设想,关于时政记部分,朱希祖认为“中央党部重要会议记录,及行政院重要会议记录足以当此”^{[12]171},则“仿宋三省与枢密院各撰汇送史馆之例,可由五院及军事委员会各辑辑重大政要可以发表者,月成一册,各送史馆”,“党史编纂处所编纂党部重要史记,亦宜月送或季送、年送国史馆,以备采入于时政记及日历、国史”。^{[12]172}从国史编撰史料来源看,“除党史编纂处所送党史及本馆所撰时政记、日历外,内采国民政府总档案库之档案为史料,又当特设史馆藏书所,以采集政府各种公报及内外日报、周报、月报,以及私人笔记、日记、文集、诗集,与夫统计年鉴、私史、外史(外国人记载中国史籍)、专史(如中国外交史、财政史之类)等,以补公家史料之不足。”^{[12]173}事实上这里已经从党史国史的报送权限、所依据史料来源涉及到国史与中国国民党党史的关系问题,只不过这里讨论的是中国国民党史与那个时代的国家史的关系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朱希祖还可能认为党史、国史之间的关系并非一个学术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党的决议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如他在议案的结尾中将划分清楚党史与国史的界限问题作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划清党史、国史界限,俾各尽其职。否则,党史或过于庞大、或过于狭小,必茫无头绪,无从措手,俟各项略有端倪,规模粗立,然后规划日历及国史,如此则次序井然,有条不紊,实施既易,成效可期。”^{[12]173}这个意见在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朱氏看来,有关国民党党史与国史的关系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决议就可以解决的,这也一定程度上表明,党史与国史的关系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进一步关注。顾颉刚于1945年撰写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对于前此100年以来的中国史学给予了中肯评价,开门见山对“当代史的撰述”加以品评,也反映出作者对当代史著述的重视之一斑。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应该用“很大的篇幅”来阐述“国民党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国民党五十年来的历史,也应该是近代史最光辉的一部分”。

三、新中国国史编撰的得与失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件。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之前就已经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兴趣并进行了一些研究。^{[13]327}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拟被作为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1957—1969年)中“需要加强的薄弱学科和空白学科”来建设,也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等研究成果。中国国内以中国当代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命名的学术研究与编撰则是自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0多个春秋。其间,党和政府组织的编修国史的重要行为有两件大事——编纂《当代中国》丛书和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

(一)《当代中国》丛书的编纂。1982年5月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组织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分门别类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7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提出组织编写和出版一部大型丛书的方案,以作为建议报送胡乔木、邓力群、马洪。其中即包含了《当代中国》丛书这个名称及其内容的基本构成、质量标准等。11月,中宣部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中央宣传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同月,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并指示中宣部转发党政军各部门和一些人民团体。从1982年5月胡乔木倡议总结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始到1999年6月,《当代中国》丛书150卷全部出版止,先后动员了约十多万名学者和干部参与编写。^{[14]599}而参与各部门各地方征集资料的人员以及提供资料的人员更是不计其数,极大地普及了当代史知识,为中外出版史上所罕见,成为当代史学史上的瑰丽篇章。

《当代中国》丛书是一部旨在记录干部、群众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总结各地区各部门业务本身的发展成就和经验教训的“奠基性著作”,达到了“为进一步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准备”的初衷。^{[15]83}正如胡乔木所指出的,《当代中国》丛书“要总结的经验,主要不是政治方面的,而是各部门业务本身的发展,本身的成就和经验”,是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分门别类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14]594—596}这就使得《当代中国》丛书的编纂视角一开始即是更多的精力用来关注地方和各行各业。由于实行的是主编负责制,编委会和编辑部在主编领导下工作,这就在事实上实践了以往学者所提出的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编撰国史,以实现真正反映民众的“公史”、“民史”的设想。《当代中国》丛书主要反映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社会主义制度、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设强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历程。这就反映出“各地虽统一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因主客观条件不同,执行的情况和结果就不同”,各卷“分别记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局的演变及各方面行业的发展”,“分别反映了各地的特色,在全国范围内的不同战略地位,以及各自的发展前

景”^{[16]13}。从主观上看,很多卷的编撰者都具有这种自觉。例如梁步庭在《当代中国的山东》中指出:“在我们过去的工作中,不论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既有同全国一样的共性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和不同情况。”“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怎样把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与山东的实际相结合?领导机关决策正确与否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与影响?”等等,都是很值得研究、总结、深思与铭记的。^{[17]2}

(二)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五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当代中国研究所于1990年成立后不久,即在西安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1991年3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转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纪要〉的通知》。《通知》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纪要》转发给你们。写出一部符合实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必须依靠全国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请你们给予积极支持。”^①7月26日,中央明确规定了当代中国研究所所以“集中力量把《国史》写好为宜,行有余力再兼及其他”^②的任务。1992年10月,当代中国研究所开始酝酿成立编委会,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至2012年9月中央审定、批准出版,前后经历了20年。第一阶段,从1992年到2009年,主要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人员讨论提纲,按照提纲撰写初稿,然后集中讨论、充分交换意见,再分卷调整、充实、提高,同时征求部分研究所以外学者意见。如此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形成初稿定稿本。从2009年到2012年,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央领导指示精神,组织、协调中央和国家30个部委两次审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并提出修改意见。2012年又组织了18部委第三次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国史稿》编委会领导统稿小组又进行了全面审改。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一书于2012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正式出版。

《国史稿》的编撰也充满了艰辛,副主编李力安曾用“二十年风雨写春秋”^[18]来形容该书编撰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其中最为重大的结构上的变动就是将曾经作为一章的“绪论”独立出来单独成为一卷,成为“序卷”。“序卷”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中华民族远古至1949年10月1日前的历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序篇呈现出来,而避免“把‘昨天和前天’浓缩成某种版本的通史、断代史或专题史”^{[19]108}。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编著者将序卷分为“辉煌灿烂的文明古国”、“近代中国的社会沉沦与救亡图存”、“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抗日战争与人民政权的发展”、“中国两种命运的历史

① 当代中国研究所办公室编《当代中国研究所大事记(1990—2010)》内部资料2010年版第006页。

② 当代中国研究所办公室编《当代中国研究所大事记(1990—2010)》内部资料2010年版第012页。

性决战”六章,则是长时期摸索的尝试。最值得称道的是,《国史稿》初稿完成之后的研讨与研修、研磨。自1991年至2000年,邓力群就《国史稿》的编撰工作陆续发表了约20万字的讲话,这对于推动《国史稿》的撰写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讲话多是在《国史稿》初稿撰写出来之后修改研讨会上的讲话,由此也可以看出集体研讨对于提升编撰者对国史性质属性的认识,对于提升《国史稿》的学术质量是至为关键的。以第一卷的研讨为例,1993年8月20日至31日,邓力群主持第一次集体研讨,1995年5月8日至26日、7月4日至10日第一卷第二轮讨论,2000年5月10日至31日第一卷第三轮讨论。其他各卷的讨论也基本上遵循大致的程序。这些讨论的特点是:“邓力群亲自抓写作,写国史是全所唯一的重点工作。方式是集中所内外专家大讨论。”^{[19]114}在这些讨论会上,“与会人员年长者已逾80岁,年轻的才二三十岁,但在会上均能畅所欲言,可滔滔不绝,也可三言两语。不仅对第一卷的修改提出很多好的意见,同时也大大深化了如何撰写不同于党史的国史认知。”^{[19]114}这时期是《国史稿》编撰顺利推进的阶段,当然《国史稿》编撰也曾遇到过挫折和困难。面对“白头可期,汗青无日”^{[3]170},甚至“鬓发皆染霜”^{[19]131}的喟叹,笔者也只能感叹古今修史之难何其相似也。

四、几点启示

人们探讨如何编撰中国当代史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首先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开展这一研究的必要性与研究对象问题。这一讨论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当代人写当代史问题的认识。21世纪以来,随着共和国史编撰实践的推进,人们关于中国现代史与当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中共党史关系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化。人们从学科建设的视角对相关问题的重新考量,标志着有关国史编撰问题的理论色彩渐趋强烈。

第一,官修与私撰是当代史研究与编撰两条不可偏废的基本路径。这两种类型的史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有时甚至相互转化的情况也不少见。从中国史学发展的状况看,有明一代在国史纂修方面以实录见长,不见在实录基础上的国史著作传世。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批评,从中可以看出明代学者对国史价值的认识。张岱曾严厉批评了明代不修国史的做法,认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谏,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20]2}还有学者认为明代“无史”^{[21]136}。当然这些都是对于明代国史撰修总体状况的绝对性评价,有些武断和片面。正是由于有明一代官修国史著作的阙如,这给私著国史留下了极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明代私家撰修国史兴盛一时的重要原因。王世贞针对本朝的史学概括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及其“不可废”的原因,他认为:“国史人姿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赞宗阔、表官绩,不可废也。”^{[22]361}至此,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关当代史价值及局限的认识变得辩证而深刻,达到了一个

新的理论高度。从共和国史研究与编撰的现实看,史学界的私人撰修已经有了相当的学术基础,无论是从学理的探讨,还是从编撰实践经验的积累,还是从中国当代史与共和国史研究论著的推出,都较国家层面上的编撰丰富得多,这为官修权威的国史著作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第二,当代修史与后世修史的价值同样值得肯定。认为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观点除了事实上受西方所谓学术研究客观中立的观点影响之外,还有对中国史学发展似是而非的认识。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其史学批评名著《史通》中对唐以前国史撰述作了总结性的批评。刘知几认为,当代人的文献积累和撰述是“为史之道”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他指出:“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3]93}在这里,刘知几对于当代人所修史书在文献上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与后世修史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前者在文献积累、器局草创方面,后者在史实论断、历史评价方面各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古人尚且明白当时之创与后来之篇“相须而成,其归一揆”的道理,时下主张碍于错综复杂的当事人的恩怨情仇,历史事件的人事纠葛,党派利益束缚,涉及主流意识形态的羁绊,得出当代史并不能够修成,乃至并没有研究的必要的结论,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殊不知,当代人修当代史与后人修前朝史是中国史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两大驱动力,当代史著述是后人修史的重要依据,完全没有参照当时人著述的历史研究成果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常设修史机构与临时召集研究编撰应该适当平衡。临时召集课题组或写作班子攻关突击,是时下带有官方背景的研究与编撰中时常采用的组织机制。这一形式具有高效、节俭、见效快的优点,但也有诸如连续性差、投机性强、整体性把握不足等局限。诸如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官方制定并通过的带有共和国史研究指南性质的重要文献,当时起草这个决议的就是在邓小平领导下,由胡乔木组织班子具体起草的,决议完成,班子解散。纵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当代中国丛书》的编撰也是书成人散,没有留下总揽全局的机构和人员,各部门书成之后的大量文献也不知所终,应该说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以研究和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主业的专门机构,但这一机构一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行政上代管,始终没有在中央或者国务院的编制序列中体现出来。经过20年的兴衰荣辱,这个国史馆的过渡机构最终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隶属的一个研究所。1935年著名清史学家孟森曾撰文指出:“今闻人言政府不主张即设国史馆,而谋设保管档案之所,是即悟史有原材矣。然档案何以能受保管?何以信其所保管之档案必无缺漏作伪之弊?此事当鉴于前代,当知吾国自三代以来,有一贯之为国留史方法。今用最明显之叙述,则由最近之代,递推而上,以知吾国之治国史实成一种定律。”^{[23]302}在孟森看来,欲治国史必先设国史馆,以笼络史

才与史材。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史学中有着丰富而深厚的史学遗产,正如孟森所言:“继今有预存国史者,必斟酌取法而后可也。”^{[23]308}设立国史馆,或许是中国传统史学之于当代中国史学发展最重大的启示之一。

第四,公史、官史、私史应当“分雁行相鼎足”,即便公史难成,亦“无害私史官史之互存而并见”^{[12]167}。这里并不打算赘谈官史与私史的关系,而是觉得公史之概念的提出,对当前的国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钱穆所提出的“公史”是有一定的继承性的,与梁启超、田北湖等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讨论的“民史”具有一定的学术渊源关系,较之又有所发展。田北湖将“民史”等同于原始人类的原始社会的纪录,梁启超尽管在许多场合和不同论著中涉及到“民史”,但其论述的着重点始终是君史与国史的关系,在梁启超的思维中国史与民史具有一定的同一性。1953年钱穆则明确将其加以区分,指出了“太炎所谓‘不需有史’,此虽一时之愤辞乎?或其意指官史之不可有而言。而私史又不胜其剧,一手之烈,难期总揽,则又何如提倡为公史”^{[12]167}。欲撰尽揽官史、私史的公史,确实是困难重重。但他并不认为不可能,在钱穆看来,各县、各省、各名胜古迹遍设图书馆、博物馆以搜罗籍界内“典籍器物、著作产造,博及天文地理、其后物宜、建置交通、工艺美术、风俗习尚、信仰禁忌、人物家世、流移迁转、摄影造像、标本图标、测量统计一切皆附,而推择其县之耆贤学人,组委员会,各以所长,分司编纂调查保管记录之责”,但凡遇到“灾祥变故,兴革利病,并皆按时书之,遵类例而条董之,积岁月而刊布之”^{[12]166}。公史编撰的体制、机制、式样等已经呼之欲出了。这强调了民众在编撰公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事实上触及到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所给予的启示是:在当前国人撰著的当代史著作中应该充分关注到民与国、民与党之间的关系。钱穆所理想化的国史即为公史,他认为:“昔者一代之史,掌诸一官,今则一国史,藏之通国。而史藏职权,则转归于社会,于学术团体,又明著于国家之宪章,悬为定制,政府不加干预。此其意,亦我先民所素有,且已见之于制度行事,而特因时势之变而变通之焉耳。”^{[12]166}这当然是钱穆理想化的修史状态,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但他提出的于公史之中弘扬民族之精神、阐扬我国民之业绩的思想还是值得今天国史编撰者关注的。

第五,国史编撰的政治性与科学性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来源于史学的政治性与科学性,而这一问题在国史研究中更加凸显。钱穆与章太炎耐人寻味的对话,使得这一问题变得异常严肃,也更凸显了这一问题的尖锐与无法回避。章太炎对钱穆“吾侪将何以草新史”的回答是:“此后当不再需有史,君谓犹需有史耶?”钱穆对章氏之论作了诸如“官史之不可有”的猜测,但却触及到了党派与国史之关系的肯綮。钱穆所论:“古者仅避一帝王,今则政体改制,一党之逆鳞,岂翹颈下之盈寸。良史难为,视昔尤甚。”^{[12]167}而朱希祖对于党史与国史关系的厘定则显示了一代史家对于现实所提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朱希祖提出应将时政记、日历、国史统归国史馆撰辑,而国史馆直隶于国民政府,以区别于党史编辑处。朱氏先规划党史规模,然后规划

日历与国史的意见不仅凸显出“二者性质迥不相同”,而且也划分清楚了两者的界限,出现“次序井然,有条不紊”的局面。^{[12]173}这也已经显示出朱氏对这个问题并非单纯学术面相的认识。时下,学界有人将国史的人民性与党性对立起来,也有人以党性遮蔽了国史研究与编撰中的人民立场,这事实上都涉及到了国史编撰如何正确处理党的地位和作用二者的关系问题。

参考文献:

- [1] 班彪. 后汉书·班彪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 班固. 汉书·司马迁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 刘知几. 史通·杂说上[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 [4] 施丁. 司马迁写当代史[J]. 历史研究,1979,(7).
- [5] 李百药. 北齐书·魏收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6] 宋濂,王祜. 元史·仁宗纪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 [7] 瞿林东. 中国史学史纲[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 [8]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9]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0] 蔡尚思. 方行.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1] 田北湖. 论文章源流[A]. 舒芜、陈迥冬等编选:近代文论选下[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 [12] 朱希祖. 中国史学通论 史馆论议[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3] 费正清. 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 [14] 夏春珍主编. 五十年国事纪要·文化卷[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 [15] 吴家驹. 《当代中国》丛书将于一九八四年底陆续问世[J]. 读书,1984,(1).
- [16] 吴家驹.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回顾[J].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4).
- [17] 梁步庭. 当代中国的山东·序言[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18] 李力安. 二十年风雨写春秋[N]. 光明日报,2012-9-28(02).
- [19] 田居俭.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的立意与谋篇[A].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出版后的思考[C].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 [20] 张岱. 石匱书自序[A]. 琅嬛文集[C]. 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
- [21] 郎瑛. 七修类稿[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 [22]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3] 孟森. 国史与国史馆[A]. 谢泳编. 独立评论文选[C].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

A Study on Compiling Contemporary History by Contemporaries

CAO Shou-liang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 the CASS , Beijing 100009 , China*)

Abstract: It is regarded as a very popular view that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written by contemporaries is not real nor objective. This is an incorrect point of view. It is a fine tradi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for contemporaries to write contemporary history. The discussion on history of the people , history of the monarchies , history of the nations and the history of Kuomintang Party can be taken as the recognition of this viewpoin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is possible and necessary to write contemporary history after compiling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biggest revelation is to set up the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Key words: contemporary history; the official compilation; the private compilation;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上接第 23 页)

- [10] 胡应麟. 诗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11] 谢榛. 四溟诗话[A]. 丁福保辑. 历代诗话续编[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12] 崔炼农. “乱”之源流考辨——《乐府诗集》音乐术语丛考之一[J].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2006 ,(3).
- [13] 杨荫浏.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 [14] 叶桂桐. 论孔雀东南飞为文人赋[J]. 中国韵文学刊, 2000 ,(2).
- [15]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6] 陈勤建. 文艺民俗学导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 [17] 何涛,张桂萍. “辞”“赋”与乐府[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1 ,(3).
- [18] 胡适. 白话文学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19] 冯沅君. 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C].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Vulgar Fu and Yuefu in Han , Wei and Six Dynasties

MA Yan , LENG Jiang-sh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 Guiyang , Guizhou 550001 , China*)

Abstract: Vulgar Fu and Yuefu come from folk and reflect social life. They interact and accept each other ,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me , technique , mode of transmission and so on. Interaction is based on these contents which include revealing the miserable life of people living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 narrating birds story , ridiculing the ugliness of characters and prasing the beauty. The requirement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layout of lengthy , performers , presence at the end of Fu and the activity of collecting ode into poem in Yuefu. The similarity in mode of transmission , performing time , place , purpose and audience is the root cause of interaction.

Key words: Han , Wei and Six Dynasties; vulgar Fu; Yuefu; relationship